

王莲英 袁涛 编著

MUDANHUA 牡丹花



中国传统名花丛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牡丹花

王莲英 袁涛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牡丹花 / 王莲英 袁涛编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中国传统名花丛书)

ISBN 7-112-05084-7

I. 牡... II. ①王... ②袁... III. 牡丹—观赏园艺
IV. S685.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854 号

中国传统名花丛书

牡丹花

王莲英 袁涛 编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86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56.00 元

ISBN 7-112-05084-7

S · 44 (1061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本书是中国传统名花丛书之一。全书介绍了牡丹花的国内外栽培历史和现状,牡丹的种质资源、形态特征、品种、花型、生物学特性、繁殖、栽培管理、引种和育种等。本书可供广大牡丹花卉爱好者、园林园艺工作者学习参考。



前 言

从1987年《牡丹》第一版出版，至今已14年有余。这14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时期，国兴花发，花卉业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牡丹，这一中国的传统名花，在这一时期不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国花评选中，荣登众多候选国花之首。人们不仅热爱牡丹，认识牡丹、了解牡丹的愿望也更强烈了。显然，第一版《牡丹》的内容已不能满足和适应人们的要求。

可喜的是，经过14余年的努力，花卉工作者对牡丹的认识及应用上了一个新台阶。通过广泛的野外考察、标本核对、文献检索和大量的室内外工作，牡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1. 对牡丹的起源有了突破性的认识：牡丹不是单源起源的，而是由多个野生种相互杂交的后代逐渐演化而来的杂种群体，仅少量品种直接来源于某个野生种；
2. 发现了新的野生原种，明确了其分布区；
3. 对品种资源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划分出了四个形态、分布和特性各异的品种群；
4. 品种分类更加科学合理，也更为全面细致，并正式提出了品种形态记载标准；
5. 各品种群都不断有新优品种育出，野生资源的引种和保护工作也逐渐开展；
6. 出现了新的栽培和繁殖技术。无土栽培的优越性逐渐被牡丹生产者认识，促成栽培技术在牡丹产区得到迅速发展，与之配套的牡丹复壮栽培技术随之产生；随着新的病虫害的出现，病虫害防治的技术和水平也有所提高；新的繁殖方法不断出现，如“双

平法”、“快速贴接法”等；

7. 应用方式更为丰富。除传统的专类园、花台、花带外，盆栽、盆景、室内装饰、反季节展览等大量出现；

8. 基础研究成果丰富，涉及学科范围广。植物分类学、形态解剖学、生殖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细胞分类学、孢粉学等学科均有涉及，并在品种分类、起源与演化、生长发育、采后生理生化、贮运保鲜、花期调控、远缘杂交等研究方面成果显著。

以上这些新成果，多数在本次再版的《牡丹花》中得以体现，与第一版相比，再版的内容得到大大的充实，对牡丹各方面的阐述更全面、更具体，科学性也更强了。本书的主要编著者是著名的花卉专家王莲英教授和她的学生。在王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他/她们从事着牡丹各个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本书的编著者分工如下：国内外栽培历史和现状由冉东亚执笔；形态特征由王莲英教授执笔；生物学特性、引种和育种、栽培工作月历和附录由袁涛执笔；品种花型分类、繁殖和栽培管理由高志民执笔；我国牡丹的种质资源由袁涛、陈新露执笔；品种介绍由李丰刚、袁涛、陈新露执笔；主要病虫害及防治、应用及丹皮生产由刘晖执笔。照片由李丰刚、陈德忠、袁涛提供。全书由王莲英、袁涛审校。

限于著者水平所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一、 国内外栽培历史和现状	1
二、 我国牡丹的种质资源	11
三、 形态特征	25
四、 品种花型分类	42
五、 品种介绍	55
六、 生物学特性	123
七、 繁殖	137
八、 栽培管理	149
九、 引种和育种	167
十、 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	186
十一、 应用及丹皮生产	197
十二、 栽培工作月历	206
附录1 种和品种名汉语拼音索引	209
附录2 种和品种名中文笔画索引	211
主要参考文献	213



一、国内外栽培历史和现状

(一) 我国牡丹的栽培历史和现状

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是芍药科、芍药属的落叶亚灌木, 我国特产的传统名花, 是世界上园艺化最早、栽培技术较高的花卉之一。中国牡丹栽培历史悠久, 一直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追溯牡丹的发展历史, 可以概括为四个发展阶段:

1. 野生到引种栽培阶段 (东晋至南北朝, 589 年之前)

在我国秦朝之前的典籍中, 牡丹和芍药不分, 混称为芍药, 后来才把草本者称为芍药, 木本者称为木芍药 (宋·郑樵《通志》), 木芍药即牡丹。牡丹一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 “牡丹味辛寒,

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此书是两汉以来有关药物的经验汇编。1972年，甘肃武威市柏树乡考古发现东汉古墓内的医简中有牡丹治疗血淤病的记载。可见牡丹进入人们的生活，最早是从药物开始的。在东汉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了牡丹的药用价值，并用于治疗。牡丹之名，因它“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指可无性繁殖），其花红色，故谓丹”（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此外，牡丹又名百两金、富贵花等。南朝宋·谢灵运称：“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水际竹间多牡丹”（《谢康乐集》）。谢灵运于422~423年为永嘉太守，应是记述当时、当地之所见，说明牡丹作为野生花卉已引起人们的观赏兴趣。唐·刘禹锡云：“北齐（550~577年）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已久矣”（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可见南北朝（420~589年）时牡丹已逐步从野生引为栽培。过去多据此认为牡丹的观赏栽培历史有1500年左右。但重新发现的宋·余仁中本《顾虎头列女传》画中描绘的庭园栽植的木芍药判断，当时牡丹已引进庭院栽培观赏了。顾虎头即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约344~405年），距今约1600余年。这样，牡丹观赏栽培的历史就向前提了100多年，即有1600多年了。

2. 逐步发展阶段（隋唐及五代时期，581~960年）

牡丹观赏品种的出现，最早的记载见于隋代。隋炀帝（605~618年）时“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易州（今河北省易县）进二十箱牡丹。有‘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唐·韩偓《隋炀帝海山记》）。不久隋亡，唐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长安牡丹逐渐兴盛起来。当时牡丹稀少珍贵，首先在宫廷御苑栽植。唐·舒元舆《牡丹赋序》云：“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2年）时，宫中及民门竞尚牡丹”（《事物纪原》）。达官显贵，无不着力多方搜求，

如“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巢，植于长安私第，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中为都下奇货”（《酉阳杂俎》）。唐玄宗时，李白为牡丹填写新词，赋清平乐3首，极写纯白、红紫、浅红等三色牡丹的丰姿秀色，以牡丹之美，赞誉杨贵妃之美貌（宋·乐史《杨妃外传》）。“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千余年来脍炙人口，成为千古绝唱。由此牡丹之名大噪。唐敬宗（825~827年）时，李正封咏牡丹诗云：“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遂有“国色天香”的誉称，更加身价百倍。当时寺庙道观也竞植牡丹，如慈恩寺、兴唐寺等。长安富户和平民皆尊崇牡丹，酷爱牡丹，开花时节，万人空巷，诚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所说：“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车马如狂，以不就观为耻”（唐·李肇《国史补》）。“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唐·白居易《牡丹芳》）。一时牡丹风靡长安。牡丹价格也扶摇直上，“人种以求利，一本值数万者”（《国史补》）。即使如此昂贵，长安人于花时仍“相随买花去”，达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的狂热程度。长安牡丹的发展，逐渐波及到其他地方，首先是陪都洛阳牡丹得到发展。“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后唐庄宗（923~926年）“在洛阳建临芳殿，前殿植牡丹千余本”（宋·陶谷《清异录》），其规模不亚于唐宫。

牡丹也南下杭州。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约821~824年），曾在开元寺见寺僧从京师移来的牡丹花（唐·范摅《云溪友议》）。

此外，唐代东北牡丹江一带建有渤海国，与唐交往甚密，在禁苑，牡丹、芍药及奇花异卉遍植苑内，其“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为园地植牡丹，多至二三百本，有数十千丛生者”（《松漠纪闻》）。该地的牡丹，随渤海国的灭亡而绝迹。

随着牡丹栽培的发展，唐代已选育出重瓣品种。“穆宗（821~825年）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杜阳杂编》）。而宋·欧阳修在《洛阳牡丹图诗》中云：“传闻千叶昔未有，只从‘左紫’名初驰。”据宋·周师厚《洛阳牡丹

记》(1082年)载:“‘左紫’千叶紫花也…国初(指北宋初年)生于蒙民左氏家。”唐代牡丹栽培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对新移栽的牡丹,“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白居易《买花》)。做到“百处移将百处开”(白居易《移牡丹栽》)。另据柳宗元《龙城录》称:“洛人宋单父,字仲孺,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上皇(唐玄宗)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从当时栽培水平来分析,可能是用自然杂交的种子播种,经过选择而形成的。

3. 兴旺发展时期(北宋至明清, 960~1911年)

这一时期历时较长,经历了宋、元、明、清几个阶段,其间几经兴衰,尽管元朝和清末处于发展的低潮,但总的趋势仍是向前发展的。

北宋时,牡丹栽培中心移至洛阳,洛阳的牡丹开始发展起来,从此洛阳牡丹名冠天下。洛阳人特别推崇牡丹,养花、赏花成为风尚。“洛阳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以下简称《李记》)，“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简称《欧记》)。“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李记》)。所谓花园子，是指洛阳专种牡丹的天王院，每到花时“张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仕女绝烟火游之”(《李记》)，形成庞大的花会、花市。洛俗喜在头上插牡丹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欧记》)。当时育种技术有很大提高，运用嫁接法固定新变异和繁殖苗木，新品种不断涌现，所以欧阳修当年曾惊呼：“四十年间花百变！”在此基础上，牡丹专著先后问世。欧阳修《洛阳牡丹记》(1034年)刊出。此书包括三部分，花品叙、花释名和风俗记。书中列举洛阳牡丹名品24个，其中重瓣(千叶)品种13个，复瓣(多叶)品种8个，单瓣(单叶)品种3个。并解释花名的由来；介绍洛阳人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习俗；对牡丹的分布、品种变异和育种途径，花形演进趋势，以及牡丹栽培经验，都做了简要而深刻的记述。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牡丹专

著，对中国花卉学、品种学和栽培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0年后，欧阳修的《洛阳牡丹图诗》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后来周师厚著《洛阳牡丹记》（1082年）对《欧记》做了增补，记述牡丹56个品种，与《欧记》相重复的品种有10个。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近50年的演化，《欧记》中的复瓣品种“一百五”、“一捻红”演进为重瓣品种；单瓣品种“甘草黄”因名园培壅之盛，也变成了重瓣品种。为牡丹品种由单瓣逐渐演化成复瓣乃至重瓣，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也说明优越的栽培条件是加速品种花形演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后又写《洛阳花木记》，列举牡丹品种109个，芍药品种41个及其他重要花木。其后张岫《洛阳花谱》，列牡丹品种119个（《曲洧旧闻》），其中名品辈出，正如当时洛阳地方留守钱惟演云：“人谓牡丹花王，‘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至今“姚黄”、“魏紫”仍为牡丹品种中的佼佼者。北宋末年战乱频仍，赋税沉重，洛阳牡丹日趋衰败。

唐宋之交，四川成都的牡丹也开始兴盛起来。前蜀后主王衍的舅父徐延琼自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僧院购到一株年代久远的牡丹，经1500km，移入成都新宅，这是蜀引入北方牡丹的最早记载。后蜀后主孟昶（934~965年在位）引种许多牡丹“于宣华苑广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苑……蜀平，花散落民间。小东门外有张百花、李百花之号，皆培子、分根，种以求利，每一本或获数万钱”（宋·胡元质《牡丹》）。

南宋时期，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牡丹享有盛名。天彭牡丹始于唐代，杜甫曾有诗《天彭看牡丹阻水》。宋·陆游《天彭牡丹谱》（1178年）云：“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崇宁（1102~1107年）、宣和（1119~1126年）年间，州民多从洛阳购回新花，从此天彭牡丹名冠两川。“人谓之多叶者京花，单叶者川花，近岁尤贱川花，卖不复售。”“天彭号小西京（北宋以洛阳为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以清明、寒食最盛。”可见南宋时蜀人爱牡丹，花时狂欢的情景不让洛

阳。《陆谱》记载了洛花以外的四川本地牡丹品种 34 个，只有品名内容不详者 31 个品种，共 65 个品种。但由于“洛花见纪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彭者。”故知天彭当时栽培的牡丹品种不止此数。天彭牡丹的主要来源有三：其一，后蜀平后，牡丹品种散落民间，汇集于天彭；其二，州民不断从洛阳购入新品种；其三，本地牡丹，多单瓣品种。清修《彭县志》载，县西北 32 里的丹景山，即因盛产牡丹而得名。“上有牡丹坪，种花最盛”，牡丹有“成树盈把者”，相传为王蜀时所植。

宋时，江南牡丹也有发展。有《越中花品》（986 年）、《吴中花品》（1045 年）传世。仲殊的《越中花品》仅存序言，谈到“越之好尚惟牡丹，其绝丽者三十二种。”《吴中花品》载牡丹品种 42 个，都与当时所载洛阳牡丹品种不同。宋室南渡后，洛阳花事衰微，杭州却得到发展，出现一些新奇品种，如“重台九心淡紫牡丹”、“白花青绿牡丹”等。

元代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长安、洛阳等地能见到的好品种已屈指可数，品种退化，重瓣品种难得一见，因有“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不恒有者”（姚隧《序牡丹》）之叹！

明代，牡丹栽培得到了恢复。栽培中心也移到了亳州（今安徽省亳县）、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国都北京牡丹栽培也逐渐繁盛起来。江南太湖周围，西北的兰州、临夏也有所发展。这些地方的牡丹栽培多延续至清代及至民国时期。

明·薛凤翔《亳州牡丹史》（约成书于 1613~1617 年）记载正德、嘉靖（1506~1567 年）年间，有薛、颜、李诸家“遍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不惜重金购买名种，“每以数千钱博一少芽，珍护如珊瑚。”因而亳州牡丹日渐兴盛，到隆庆、万历（1567~1620 年）年间，“足称极盛”。此书记载牡丹品种 274 个，其中有性状描绘者约 200 种。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钮绣撰《亳州牡丹述》记 141 个品种。

曹州与亳州的牡丹于明代万历（1573~1620 年）年间达到繁

盛。只是当时亳州新种较多，名声较大，故成为明代中国牡丹栽培中心。两地之间相互交换品种，“曹花多移自亳”（清·余鹏年《曹州牡丹谱》）；亳州也引入不少曹州名品，如“金玉交辉”、“平安红”等10余品种，其中“状元红”是弘治（1488~1506年）年间得之曹县的，可见，曹州引种牡丹可能比亳州更早。清·蒋廷锡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部》载：“尝考牡丹，初盛于推下（即洛阳），再盛于亳州，至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到清初就有“曹南牡丹甲天下”（余鹏年《曹州牡丹谱》1792年）之誉称。曹州牡丹盛于明清两代，持续时间很长。赵世学撰《新增牡丹谱》（1911年）记载曹州牡丹240个品种。

北京自辽、金建都于此，牡丹栽培日渐兴盛。明代的《北京考》上记载辽圣宗（982~1031年）在统和十二年（995年）3月去长春宫观赏牡丹。明清时北京仍为国都，在明代，牡丹栽培极盛，“金殿内外尽植牡丹”。除官室官署外，城外还有三大名园栽植牡丹。一是梁家园（今北京宣武门外梁家园一带），“园中牡丹、芍药几十亩，每花时云锦布地，香冉冉闻里余。论者疑与古洛中无异”（《篁墩集》）。二是清华园（今北京大学西墙外）是明朝外戚李伟的别墅，园中“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泽农吟稿》）。《燕都游览志》云：“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足称花海。”三是惠安园，又称张园（今阜成门外花园村一带），园主为惠安伯张元善。刘洞、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都城牡丹时，无不径往惠安园者，园在嘉兴观西二里，堂前牡丹数百亩”。据《顺天府志》和《帝京景物略》记载，“右安门外草桥，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煺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当时城南丰台、草桥一带，有18个村以种花为业，其中排林村种牡丹最为著名。通过促成栽培技术，使牡丹初冬即可开花，进御皇宫。明代北京极乐寺盛栽牡丹，“距桥（高粱桥）可三里，为极乐寺址，寺天启（1621~1672年）初年犹未毁也，门外古柳，殿前古松，寺左国花堂牡丹”。可见把牡丹尊为国花，非自清代始，明代已有此誉称。清代时，极乐寺得以重建，寺东遍植牡丹，国

花堂匾额由成亲王手书。

清代，皇宫内鲜花四时不断，牡丹成为冬季室内装饰。清末皇宫御花园、颐和园国花台和白纸坊崇效寺栽培较盛。颐和园国花台又名牡丹台，在排云殿以东，始建于1903年，台上遍植牡丹，慈禧敕定为国花，并命将“国花台”三字刻于石上。崇效寺即唐之枣花寺，昔以丁香、枣花称盛，清末以来，以牡丹冠绝京华，栽培有方，又多佳种，尤以绿、墨二色最为珍贵。北京花农一般从曹州购进牡丹，一部分盆栽作促成栽培供春节用；一部分植于圃地，出售苗木。

明清之际，甘肃牡丹也悄然兴起。甘肃省大部分地区都有牡丹栽培。而以兰州、临夏、临洮一带为栽培中心地。兰州金天观牡丹传为唐代遗物。清末编纂的《甘肃新通志》曾有牡丹在甘肃“各州府都有，惟兰州较盛，五色俱备”的记载。临夏古称抱罕、河州，曾是西秦王朝的京都。明编《河州志》（1563年）已有牡丹栽培的记载。清代陇上诗人吴镇（1721~1797年）诗云：“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1949年前编修的《河州志》曾有“牡丹旧有数十种，近来栽培得法，冠绝全省”的说法。

江南牡丹中有宁国牡丹和铜陵牡丹。关于铜陵牡丹，据《铜陵县志》载：“仙牡丹长山石窠中，有白牡丹一株，高尺余，花开二、三枝，素艳艳丽。相传为葛洪所种。”葛洪为晋代人，按此传说，江南牡丹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所谓仙牡丹类似“凤丹白”。安徽《巢县志》《无为县志》均记产白牡丹。

广西灌阳也产牡丹，据明修《广西通志》记载：在广西“牡丹出灵川、灌阳，灌阳牡丹有高一丈者，其地名小洛阳”。

清末至民国期间，由于国运衰落，战争频繁，牡丹产地大多民不聊生，栽培规模和品种数量不断减少。如清朝时所修的《洛阳县志》记载了古代和当时的牡丹品种169个，而到解放前夕仅保留了30个品种，江南一带的牡丹几乎损失殆尽。

4. 全面发展时期（解放后至今）

1949年解放后，我国牡丹得到空前的发展，无论品种数量、

品种类型还是栽培地区和规模，都是以往历朝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栽培技术和设施、繁育方法、育种手段、牡丹文化的普及和推广应用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品种层出不穷，目前全国可划分出中原、西北、江南和西南4个各具特色的栽培品种群。山东菏泽，河南洛阳，甘肃兰州、榆中，安徽铜陵、宁国，四川彭州等地分别成为各品种群的栽培中心。栽培品种千余个。有关牡丹的书籍大量出版发行，其中王莲英主编的《中国牡丹品种图志》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全面地介绍我国牡丹种质资源、栽培管理、繁殖、应用等等各方面的专著，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原品种400个，其中解放后育出的新品种就达316个。该书于1999年获国家林业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并于2001年获得第五届全国花卉博览会金奖。该书的出版，是我国牡丹兴旺发展的标志，也是我国牡丹发展中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其他有关牡丹的专著、画册和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二）中国牡丹在国外的发展

牡丹不仅在中国兴盛、发展，还传播到世界各地。受国外不同的赏花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与传统的中国牡丹不同的品种类型。特别是日本和欧美国家，不但从中国引入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品种，还引走了许多珍贵的野生种类，并以此为亲本，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其中一些品种在花色、生态习性及应用方式等方面都是目前我国所欠缺的。

中国牡丹于唐朝开元年间（约公元8世纪）向外流传，最早东渡日本，据说是空海和尚带过去的。日本原本没有野生牡丹分布，中国牡丹（包括栽培品种和野生原种）是日本牡丹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到17~18世纪中期，日本通过实生苗选育进行品种改良，逐渐形成了符合日本民族审美心理并适应日本风土条件的日本牡丹品种群。日本牡丹有以下特点：（1）花形扁平、松散，多为单瓣和半重瓣，花形演化程度低，即使是重瓣品种也具正常的

雌雄蕊，结实性较强。(2)花瓣质地厚，色泽纯净而鲜艳，花色齐全，一些黄色和黑色的品种十分著名。(3)花茎挺直向上，花头无下垂下弯、叶里藏花现象。此外，还有许多切花及冬季开花的寒牡丹品种，其牡丹盆栽和促成抑制栽培的技术也较先进。著名的品种有‘八千代椿’、‘初乌’、‘金阁’‘金帝’、‘岛大臣’等等。

20世纪中期，日本首先将牡丹和芍药杂交成功，这一远缘杂交的后代被称作‘Itoh hybrid’即‘伊藤杂种’，目前已形成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据染井孝熙的《牡丹与芍药》一书记载，日本现有牡丹栽培品种312个，其中日本品种211个。日本牡丹由于先进的栽培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其声誉和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都名列前茅。

欧洲于18世纪引入中国的牡丹，Joseph Banks把大批的东亚植物引入欧洲，同时也把牡丹引入了英国丘园，自此，中国牡丹在欧洲传播开来。19世纪80年代，分布于我国云南等地的紫牡丹和黄牡丹在法国引种成功。M. Lemonine等人将其作为亲本，于1900年前后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批黄颜色的品种，其花色鲜艳具光泽，与中国淡黄色的品种很不相同，这些品种被命名为‘Lemonie’系品种，其中著名的有‘Alice Harding’和‘Chromatella’等。

从19世纪开始，美国陆续从欧洲和日本引入中国牡丹，到20世纪逐渐兴盛起来。A.P.Saunders教授及其助手以从日本引入的牡丹品种及从英法引入的黄牡丹、紫牡丹为亲本，培育出了一系列金黄、杏黄、紫黑、猩红及棕色的品种，极大地丰富了牡丹的花色，但花形多为单瓣和半重瓣，中国传统牡丹中常见的楼子亚类的各种花形则很少。其中著名的品种有‘金色年华’、‘黑海盗’、‘宴会’等等。